

# 国际体系结构单元权力变化与行为互动

杨 耕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国际体系表现为国家之间由于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而形成的各种相互关系内容,并具有某种确定的内在结构层次和外在表现模式的统一体。作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单元,主权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权力规模和内涵处于不断调整过程中,促生了结构单元的权力变化与权势差异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互动现象,并成为国际体系历史进程中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 体系结构; 单元权力; 权力变动; 行为互动; 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12)04-0022-05

国际体系顾名思义,意味着国家之间由于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而形成的各种相互关系。陈玉刚对国际体系内涵有类似的表述“一些国家根据一定的规则互动而形成的一个国家体系,就是国际体系。”<sup>[1]</sup>

James Lee Ray 和 Juliet Kaarbo 指出“近代国家和近代国际体系是在 1648 年以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召开为标志而出现,威斯特伐利亚协议取代了教皇一统天下的思想被主权国家的观念所代替,欧洲国家从 18 世纪开始主张并奉行权力制衡原则。”<sup>[2]</sup>国家的权力规模和权力内涵会发生变化,而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或者其他非政府组织只是表现或承担国家权力变化的载体,黄仁伟指出“1648 年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现代国际体系的起点,它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民族国家体制的框架基础。”<sup>[3]</sup>结合学者们的观点,作者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单元变化与行为互动的主体是专指主权民族国家,因此,本文将以主权民族国家为分析对象,研究其权力变化原因和行为互动方式。

## 一、国际体系权力结构释义

国际体系中的主权国家行为体依据其所拥有的不同权力规模和权力内涵所决定的对其他行为体影响和支配作用及对体系控制和导向功能作用的大小,按照一定排列方式和层次分布组

成体系结构。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国家是通过彼此互动塑造出国际政治系统结构的单元,而且它们将长期保持这种作用。”<sup>[4]</sup>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最大区别之处在于国际社会的无序状态和成员的期待平等心理,等级关系不仅体现着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关系,而且也反映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内容,国家间存在不平等关系源自于各国所具有的权力不同,从而导致国家因其权力不同而在国际体系中所处于的层次差异,因此而形成国际体系中具有若干层次的权力结构,大国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的重要支点和主要牵引力量。

沃尔兹指出“国际政治学者只是根据大国的数量区分国际政治系统,系统结构随着系统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结构的变化导致对系统单元的行为以及它们互动结果的预期也随之变化。”<sup>[4]</sup>美国学者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认为“从定义上看,国际关系有别于政治学的其他研究,因为它关注的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sup>[5]</sup>主权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原因,除了彼此间的权力差异所形成的权力位差,还在于国际体系是一个无政府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一个主权民族国家都奉行丛林原则,在国家交往的层面上,不存在强国完全为了弱国利益而主动侵蚀自己的利益,强国不与弱国谈判和协调(或者说弱国无外交)已经成为国际交往关系的铁律。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其专著中类比例地作出如下论述,“公

作者简介: 杨耕(1968—)男,吉林海龙人,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2008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体系、大国关系、国际制度研究。

公元前416年,雅典人派特使告诫米利安人(Melians)他们或者战死或者投降,米利安人回答说他们是为自由而战,雅典人则回答说“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逆来顺受”,这句话的本意是指,在现实世界中,道德没有存在余地。”<sup>[6]</sup>主权民族国家追求权力是满足其自身生存和繁荣的必要保障,因而其所采取的无论是结盟政策,还是信奉中立立场或者是追求权力均势也必然是建构和强化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具体反映。

主权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既由其具备的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所决定,也由其所具备的权力(Power)决定,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对政治权力作出如下解释,“政治权力是权力行使者与权力行使对象之间的心理联系。这种影响力能够发挥作用源于以下三个方面:对利益的期待、对劣势的恐惧、对人或制度的敬爱和遵行。这种影响力可以通过发布命令、施以恫吓、行政权威或者是个人天生所具有的威严禀赋来实现,当然,也可能是通过以上各种因素的合理组合与有效匹配来发挥和运用。”<sup>[7]</sup>从政治权力的阐释定义来看,其内容更多表现为抽象、笼统的理论说明,虽然说政治权力的影响可以触及到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与各个领域,但是,主权民族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经常运用的却是国家权力(The Power of States),James Lee Ray和Juliet Kaarbo对权力(Power)作出了如下的定义和说明,“权力就是国际社会行为体影响其他行为体的能力。国家权力(State Power)很大程度上受国家能力所影响,国家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被解释为与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保持权力、增加权力和从事安全防卫的一种欲望。”<sup>[8]</sup>国家的权力内涵一般被认为是某个国家影响、控制和支配其他国家的能力,美国国际政治学者W. S. J对权力本质作出如下解释,“什么是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从广义方面理解,我们可以对其定义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活动的主权国家以其有形或无形的资源或者财富,通过影响和作用于国际事务,实现和追求令其满意的结果。”<sup>[9]</sup>主权民族国家拥有的权力内涵具有多层次表现和广范围指向:

(1) 主权民族国家的自然因素包括:地缘位置、领土空间、自然资源、人口因素等内涵要素。首先,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两个地理范畴,一方面是政治地理;一方面是自然地理,政治地理是指国家因其所占据的地理位置而与他国形成的恒定比邻关系,优越的比邻关系可以为本

国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安全和稳定的外部环境、投资环境与生长空间,自然地理是因国家所占据的地理位置而享有的交通条件,地缘位置既可能为主权民族国家提供增加权力的条件,也可能增加其面临生存风险的机会。

(2) 组建主权民族国家权力的政府因素体现为:政府管理国内事务的能力;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艺术水平;政府的制度设计和创新能力;政府倡导国民参加国内事务的动员和号召能力;政府重视和发展科技创新的决心和勇气;政府设计重视和发展教育的长远战略能力和水平;政府解决国家财富增长和国民财富增加之间矛盾的智慧和能力;政府对国民经济发展与注重国防投入的协调能力。

(3) 社会要素是统领主权民族国家权力的灵魂要素,其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民族凝聚力和国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分析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可见后者是前者的心理基础和前提条件。自1492年哥伦布首次尝试环球探险之后,人类社会开始了趋同一体的历史进程,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对财富的向往将世界上的各个主权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些国家相继或主动或被动地围绕经济原因开展权力竞争,并形成经济权力等级结构。对此,巴里·K. 吉尔斯认为“政治权力等级结构体现或‘隐现’在体现于世界经济上经济权力等级结构之中。”<sup>[10]</sup>

## 二、体系结构单元的权力变化

作为国际体系的主要结构单元,主权民族国家的权力变化促变国际体系权力结构是国际体系的恒定运行规律,而引发国家权力变动既决定于属于国家自身内生变量的作用,也决定于属于体系环境中对国家权力产生影响的外生变量作用,李巍在总结扎卡利亚的政权中心型现实主义理论内容时指出“只有当国家政权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取社会的资源,当政府的决策权力更加集中和统一,国家的外交政策才更加直接地对国际体系的变化做出反应。”<sup>[11]</sup>

主权民族国家权力变化的原因和表征体现在多个方面,相比较而言,同属于内生变量的政府因素容易发生变化,尤其是政府因素中的政权要素和制度要素决定着国家权力变化的走势。主权民族国家的权力内涵具体体现在以科技实力为引导、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军事实力为手段、以增强政治实力为目标,德国近代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其专著《战争论》曾经论述过“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

种手段的继续。”<sup>[12]</sup> 战争是军事手段的具体运用，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国际战略学专家——王家福先生指出“一个国家的政策，按照以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向运行，不仅会取得好的国内政治生态，而且还会增强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即沿着‘科技→经济→政治’这一方向发展，国际战略学把它称之为国策的‘正向运行’。”<sup>[12]</sup> 蒸汽革命促成了英国“日不落”帝国；电气革命实现了德国的图强之理想；信息革命则把美国推向了现代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世界之巅。科技实力具有构建国家权力的核心地位与助推国家权力发展的功能作用，对此，作者恩师——黄凤志先生鲜明地作出了理论性的说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同大国的崛起与衰落密切相关，因为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财富的多寡。西欧大国正是借助近代知识革命的浪潮，由落后的中小国家崛起为世界性的强国，而以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的衰落正是由于其忽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沦为西欧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历了近百年的苦难历程。”<sup>[13]</sup>

科技实力的变化是引发国家权力增强或者是减弱的重要诱因，科学技术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中所包含的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任何主权民族国家的劳动者一旦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理论知识和生产技术工艺，就会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效率，同时，劳动者还会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深层次地开发和利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以最少的投入、最低的消耗和最低程度的浪费，创造出品种更多、数量更大、品质更高的社会物质财富，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作者恩师——黄凤志先生指出“19世纪中后期德国的全民教育不仅为德国培养了高素质的国民，也给德国带来了创造和发明，德国也因此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潮流。”<sup>[13]</sup> 通过完备的教育体系搭建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平台，是保证国家经济发展、国家实力不断充实提高的不竭动力。

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指出“具有先进科学技术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成为国家力量的关键性因素。主权民族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所占有的国际份额直接反映了该国军事能力和在国际舞台上外交影响的变化。”<sup>[14]</sup> 西方列强依赖先进技术创造出了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军事作战能力，一方面列强们借助军事手段，多次发动殖民战争和殖民侵略，掠夺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壮大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利用先进生产技术所带来的高效生产

率生产大量的工业制成品，加大国际贸易力度，获取大量金银货币，全方位地提高国家综合力量。中国学者李滨深刻地指出“随着产业革命成功进行和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国际化之后，英国可以凭借世界工业工厂的优势，凭借工业产品的物美价廉打开一个又一个封闭的民族国家的市场，获得巨大的国际收支盈余。工业优势和巨额的财富使英国有能力建造和供养强大的海军。强大的海军与精明的外交平衡技巧使得英国保持了对欧洲大陆‘仲裁者’的优越地位，阻止其他的欧洲列强任何破坏国际关系现况的企图。”<sup>[15]</sup> 主权民族国家之间进行交往的方式和动机主要体现为商品贸易与占有市场。樊勇明指出“因贸易不平衡或为撤除这些非关税壁垒而进行交涉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贸易争端谈判，几乎成为各国外交当局的主要任务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会出于日本对美大量贸易出超的不满，曾一度威胁日本要么每年向美国交纳200亿美元至300亿美元的‘安全税’，要么撤退驻日美军和核保护伞，让日本人自己保护自己。”<sup>[16]</sup> 贸易问题往往是政治矛盾或者说是权力冲突的诱因，一个国家与它的贸易伙伴长期处于贸易不平衡状态既可能导致由于国内产业就业不足、国民生活水平下降，从而影响政府的统治地位；也可能为弥补贸易赤字会使得大量国内财富外流，国家经济实力减弱，从而推动国家参与和解决国际事务综合实力水平的下行趋势。

### 三、体系结构单元的行为互动

作为体系结构单元的主权民族国家之间的行为互动是体系形成的重要原因，赫德利·布尔(Hedley·Bull)在《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就行为体互动与国际体系形成关系提出了这样的解释：“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而且一个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决策产生足够的影响，从而促成某种行为，那么国家体系或国际体系就出现了。”<sup>[17]</sup> 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对其他国家在政策上产生影响，首先在于彼此间存在特定形式的交往可能性，通过特定交往活动和交往行为并能够建立某种联系状态，因以不同行为体为中心动源而出现不同的行为互动关系内容，陈宗权对于行为体行为互动的内涵做出以下解释“可以将‘互动’理解为行为体在特定的背景下所进行的、带有一定利益目标的相互作用的持续不断过程。”<sup>[18]</sup> 由于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处于变动过程之中，所以彼此间的互动也必然是一个相

互作用且不断持续的过程,主权民族国家的权力比较、权力实施、权力制衡与权力重组贯穿于国家行为体彼此互动的全过程。

焦兵在其文章中,从权力角度出发对国家行为体的互动关系作出如下解释“在互动关系中,行为关系或者互动中的权力运作将影响其他行为体控制自身生存环境的能力,在这里,权力变成了一个行为体所拥有的属性,该行为体可以用它来塑造其他行为体的行为或行动的条件。”<sup>[19]</sup> 一个国家真正拥有能够影响其他国家政策或者行为的程度不仅取决于属于外在表现的权力规模,重要的还取决于国家所拥有权力的具体内涵。正是由于体系单元——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才推动体系进入到发展和变动的轨迹之中。李少军对单元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功能作用作出如下分析“在国际体系中,单元作为组成部分,其基本的存在形式是互动。如果行为体不存在必要的互动,那就不能说它们之间存在体系。在这里,互动的含义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就一个体系来说,单元的互动乃是部分构成整体的必要条件。”<sup>[20]</sup> 客观上,不同国家由于具备不同的权力规模,从而在国家之间形成权势差异,尤其是在地缘位置有相邻关系的国家之间,具有权力优势的国家往往对权力劣势国家形成潜在或者是显明的威胁和压迫态势,而劣势国家的权力一旦出现向优势方向转化的可能,权力优势国家就会感到威胁并进而产生焦虑甚至要采取相应手段破坏劣势国家的优势转换。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对国家行为作出如下解释“通过对大国行为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所有大国对于彼此都是潜在的敌人。这个观点可以通过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在冷战后实现统一的态度得到证明,尽管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维持将近45年的密切盟友关系,但是英国和法国立即开始担忧由于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之间的统一对自身存在的可能潜在威胁。”<sup>[21]</sup> 国家之间之所以会视他国为潜在威胁,其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缺失中央政府权威的无政府结构状态,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期待对他国的行为和愿望做出准确的预期和判断,对此,肯尼思·沃尔兹从社会结构方面论述了体系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在国际社会结构中,每一个成员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任何成员都没有权力要求别国,其他国家也不存在被要求服从的可能性,国际体系表现为去中心化形态和无政府结构。”<sup>[22]</sup>

在以无政府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社会中,主权

民族国家按照“自助”原则分别实施均势策略、结盟策略、中立策略、依附策略或者单方对抗的策略,在现实国际交往关系中,均势策略被各国视为经常而有效的国家策略。中国著名学者倪世雄先生对均势内涵作出如下定义“均势是一种分析概念,反映国际政治中权力均衡和不均衡的各种态势及其权力态度转变的各种结果。”<sup>[23]</sup> 权力态势指各国权力依其规模与内涵在国际体系结构中分布和排列的客观状态,而权力态度则是指主权民族国家在实施权力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意志、决心和欲望。在国际体系结构中,权力优势国家和权力劣势国家是主权民族国家的客观存在事实,权势差异一定会出现优势国家与劣势国家之间的合作、对抗与冲突。

权力劣势国家还可以采取依附的方式同本地区的权力强势国家形成结盟关系,求得强势国家对自身的庇护,明显的事例是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对待其近邻——美国都采取了放任其做大的策略,当然,美国也可通过邻国的依附政策实现自身利益。樊勇明先生认为“通过强化建设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除了实现增加经济利益的目标之外,还可以实现其政治和外交战略,墨西哥和加拿大同是美国能源主要供应国,在世界主要产油区中东和平进程起起伏伏、前苏联的中亚地区局势不稳的情况下,美国从北美自由贸易区中获得了稳定的能源供应,从而直接加强了美国对中东外交和对俄罗斯外交的主动权。”<sup>[24]</sup>

此外,作为权力政策的实施方法,“域外制衡”和“离岸平衡”也是维持均势的策略形式,在二战爆发之前和冷战结束之后,英国和美国分别发挥了维持欧洲大陆权力均势的域外制衡作用和确保全球权力分布态势的离岸平衡作用,正如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36年在保守党外交事务委员会上所表述的,“近400年以来,英国的外交政策曾经而且一直是反对欧洲大陆上最强大、最富有侵略性和最有能力主导的国家,并且英国实施这一外交政策是为了阻止欧洲大陆上的低地国家落入欧洲大陆主导国家统治势力范围……因为这是我们应当遵守公共政策的准则,并非是为了应对突然发生的偶然事件而做出的权宜之计,或者仅仅是喜欢与不喜欢情绪的简单释放。”<sup>[25]</sup> 二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冷战终结、美国独自做大,美国的全球战略核心内容就是防止在欧亚大陆上出现可能挑战其全球主导地位的崛起国家,因此,离岸平衡战略便应运而生,正如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对大国和强国的行为逻辑所

进行的阐述“大国的最终目标是去获得地区霸权,并阻止相匹敌的竞争对手在全球不同地方的崛起。美国均势力量在20世纪的不同年代被派往欧洲和东北亚,其目的在于,无论何时,一个潜在的、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在这两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出现,美国都会设法去平衡之并保存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地区霸权国家的地位。”<sup>[26]</sup>

虽然“域外平衡”和“离岸平衡”两种策略的实施,更多体现出来的是对潜在大国的威胁和防范,表面上没有明显的施动行为,但是,潜在的威胁必然会带来潜在的反动或者是公然的对抗,在“安全困境”思想的主导之下,为了避免自身权力受到侵蚀,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生存状态,体系成员国权力会在主观上寻求权力因素改变,或在客观上其权力要素在其他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和影响之下被动地发生改变,进而引发成员国之间的行为互动,只要安全困境存在,国家权力的持续变化与彼此间的行为互动必将成为国际体系进程中的永恒现象。

#### [参考文献]

- [1] 陈玉刚. 多重国际体系的视野与战略[J]. 国际观察 2008 (5).
- [2] James Lee Ray & Juliet Kaarbo, 《GLOBAL POLITICS》2008 b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printed in the U. S. A ).
- [3] 黄仁伟. 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6 (5).
- [4] [美] 肯尼思·沃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M]. 信强译, 苏长和校.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5] [美] 彼得·卡赞斯坦等编.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M]. 秦亚青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6]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History Fifth Edit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2005.
- [7] Hans J. .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Revised by Kenneth W. Thompson Sixth Edit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2005.
- [8] James Lee Ray & Juliet Kaarbo, 《GLOBAL POLITICS》2008 b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printed in the U. S. A ).

- [9] Walter. S. Jones,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1997 by Addison 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
- [10]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巴里·K·吉尔斯. 世界体系: 500年还是5000年[M]. 郝名玮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11] 李巍. 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J]. 外交评论 2009 (5).
- [12] 王家福, 徐萍. 国际战略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 [13] 黄凤志等. 高科技知识与国际政治权势[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14] Paul · Kenne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87.
- [15] 李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6] 樊勇明.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版)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17] [英] 赫德利·布尔. 无政府社会: 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 [M]. 张小明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 [18] 陈宗权. 国际关系互动理论初探[J]. 国际观察 2008 (2).
- [19] 焦兵. 现实建构主义: 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8 (4).
- [20] 李少军. 怎样认识国际体系[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9 (6).
- [21] JHON J. MERSHEIMER, “Anarchy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fro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nduring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Edited by ROBERT J. ART and ROBERT J. JERVI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NOV 2005.
- [22] KENNETH N. WALTZ, “The Anarchic Structure of World Politics” fro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nduring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Edited by ROBERT J. ART and ROBERT J. JERVI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NOV 2005.
- [23] 倪世雄等.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 [24] 樊勇明.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版)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25] Hans J. .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Revised by Kenneth W. Thompson Sixth Edit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2005.
- [26]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M]. 王义桅, 唐小松,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3.

## The Change in the Unit Pow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tructure and Behavior Interaction

YANG Geng

(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 Jilin University , Changchun , 130012 , Jilin , China)

**Abstract:** International system performance for various mutual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serves as the result of the formation of mutual interaction , mutual influence and mutual restriction among those nations. Moreover , it functions as the unity of a mode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a certain level and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s. Due to the continuous process of adjustment of the size and content of a sovereign state , the changes of their powers of the structural unit and its responsive behavior interaction have already become the major content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Key words:** system structure; unit power; powers change; behavior interaction; structural adjustment

(责任编辑: 左安嵩)